

国外学界对共同富裕理论意蕴、动力机制 与实践理路的研究述要*

尹 俊 余 涛

[摘 要] 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性跨越引发了国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界对共同富裕的研究角度多元，代表性观点包括：共同富裕是纠正收入不平等、提供平等公共服务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并非复制西方社会福利模式；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共同富裕旨在为人民谋福利，且与中国高质量发展及全球共同发展需求相契合；实现共同富裕需市场、政府、社会协同，涉及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然而，也有少部分国外学者对共同富裕存在曲解和质疑。系统梳理、辨识和分析这些研究，将有助于开阔理论视野，为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参考。

[关键词] 海外中国学研究 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 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①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也强调：“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②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已迈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一系列重大的政策举措相继落地实施，这使得“共同富裕”成为国外学界热议的话题。系统梳理、辨识和分析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助于中国拓宽视野，评估共同富裕的国际传播现状，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共同富裕理论和实践的认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益参考。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实现机制研究”（24DTR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页。

一、国外学界对共同富裕理论意蕴的多维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① 这一论述为科学理解和阐释共同富裕的理论意蕴提供了逻辑指引，对国外学界关于共同富裕的认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关于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的辩证关系研究

共同富裕强调“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统一，其本质在于实现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平的双重目标。这一观点在国外学界得到了广泛讨论。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学院荣康平（Rong Kang Ping）等人分析认为，“共同富裕的本质蕴含‘共同’与‘富裕’两大基本要素，这两大要素要求实现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的双重目标”^②。日本东海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副教授法哈德·塔吉扎德·赫萨里（Farhad Taghizadeh-Hesary）在与中国学者合著的文章中提出，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首要任务是提高居民收入，巩固并提升经济总量，同时着力缩小地区差距、减少不平等现象^③。

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上，国外学界形成了基于不同立场的学术对话。受意识形态及自由主义传统观点影响，部分西方人士认为效率与公平存在根本对立。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谷（Dexter Tiff Roberts）认为，共同富裕政策会对企业的长期生产力造成负面影响，并且不太可能对就业、工人工资或国家的整体增长有利^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左翼经济学家、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约翰·罗斯（John Ross）关注到美国针对共同富裕所发出的批评声音，并对此种“效率与公平对立论”进行了有力反驳。他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华尔街金融家、开放社会基金会创始人及荣誉主席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等人宣称的“更多的平等对经济发展和效率不利”的观点。随后，约翰·罗斯通过经济数据进一步论证指出，“不平等程度较高的时期与经济增长较低有关，而平等程度较高的时期与经济增长较快有关”，这与乔治·索罗斯的说法截然相反。约翰·罗斯强调，共同富裕理论的独创性在于克服了以往对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关系的错误认识，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不仅能增加可提高人口生活水平的资源或投资，也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142 页。

② Rong Kang Ping and Chokchai Suttawet, “A Study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The National Analysis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d Data Visualizatio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Vol. 32, No. 1, 2024.

③ Yang Liu, Kangyin Dong, Farhad Taghizadeh-Hesary, et al.,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Does Common Prosperity Contradict Carbon Reductio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Vol. 79, 2023.

④ Dexter Tiff Roberts, “What Is ‘Common Prosperity’ and How Will It Change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1/12/Common_Prospersity_IB_2021_1.pdf.

能吸引外国投资,因此,共同富裕不仅不会损害中国经济,反而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①。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弗里曼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马诺杰·凯瓦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也提出,“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为了重新分配而放弃增长。事实上,解决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问题被看作实现增长的一种手段”^②。

可以看出,国外学界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呈现出方法论上的分野:一方基于意识形态预设进行推演,另一方则通过实证数据进行验证,形成了学术讨论的张力。这些讨论逐步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更注重政策分析的客观视角,但国外学界对共同富裕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探讨仍有可拓展的空间。这也是中国学界需从学理层面深入论证的关键问题。

(二) 关于共同富裕多元发展目标的研究

共同富裕并非单纯追求物质积累,而是涵盖物质、精神、文化和生态等多维度的全面发展理念,国外学界对此亦有多方面阐释。

在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方面,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唐迈(Michael Dunford)认为,共同富裕包含物质层面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等,以及精神层面的文化、伦理和价值观提升,还致力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③。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彼得·科尼格(Peter Koenig)强调,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的公平分配,更涵盖知识获取与思想交流层面的平等,并且通过教育和国际合作方式能够不断激发新思想,使共同富裕这一追求成了一个可持续的目标^④。

在精神文明建设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方面,马诺杰·凯瓦拉马尼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共同富裕的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内在组成部分”^⑤。与此相呼应,美国莫琳和迈克·曼斯菲尔德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安德鲁·科利尔(Andrew Collier)关注到中国城镇建立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认为其反映了“共同富裕的主题还包括对中国人民性格更广泛的重塑”^⑥。

在生态保护与共同富裕的互动方面,法哈德·塔吉扎德-赫萨里与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共同富裕与碳减排目标存在兼容性,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减少了碳排放,且在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省份这种影响更为显著^⑦。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将共同富裕视为一个动态概念,强调了其与环境协调、社会进步和代际公平的关系。

① John Ross, “Why Common Prosperity Is Good for Socialism and for China’s Econom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3, No. 1, 2022.

② Andrew Batson, Manoj Kewalramani, Yuen Yuen Ang, et al., “Can Xi Jinping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https://interpret.csis.org/common-prosperity/>.

③ Michael Dunford, “The Chines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2, No. 1, 2022.

④ Peter Koenig, “China’s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ts Vis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11, 2021.

⑤ Andrew Batson, Manoj Kewalramani, Yuen Yuen Ang, et al., “Can Xi Jinping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https://interpret.csis.org/common-prosperity/>.

⑥ Andrew Collier, *China’s Technology War: Why Beijing Took Down Its Tech Giant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p. 22–23.

⑦ Yang Liu, Kangyin Dong, Farhad Taghizadeh-Hesary, et al.,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Does Common Prosperity Contradict Carbon Reductio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Vol. 79, 2023.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共同富裕的研究已超越传统物质财富层面,开始从整体和系统视角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这种理解有助于深化对共同富裕作为经济目标、社会建设、文化传承和生态文明综合实践的认识。然而,国外学者在分析这些维度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贡献时,仍有研究空间。

(三) 社会公正的践行:关于共同富裕价值维度的研究

共同富裕的“富裕”是生产力范畴,要求必须追求效率;共同富裕的“共同”是生产关系范畴,要求必须实现公平正义^①。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共同富裕是新时代解决不平等问题答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指出,“共同富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②,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

在共同富裕矫正不平等的具体措施方面,国外学者提出了丰富的观点。比利时鲁汶大学助理教授多里安·埃默斯(Dorien Emmers)等学者强调,要遏制个人收入不平等和过度财富积累,推动实现更多的社会平等和经济公平^③。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研究员苏迪普·库马尔(Sudeep Kumar)从区域发展角度指出,需改善农民收入状况、丰富精神生活,并致力于缩小西部与沿海、农村与城市间的发展差距,同时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监管^④。

在共同富裕的受益群体方面,国外学者存在一些分歧。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那纳·克卡瓦尼(Nanak Kakwani)等人从发展经济学视角认为,中国的共同富裕与世界银行提出的以最贫困的40%人口为重点的共同繁荣计划相呼应,确保相当多的最贫困人口能够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受益^⑤。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研究员阿方索·桑切斯·罗梅拉(Alfonso Sanchez-Romera)则从社会结构角度强调,中国的共同富裕意味着建成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如果新冠疫情没有阻止中国中产阶级的扩大,那么21世纪20年代将是中国中产阶级扩大的十年”^⑥。韩国国立外交院的崔振柏(Choi Jinbaek)等学者则指出,中国现有政策主要是为了减轻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负担,稳定其生活^⑦。这种观点差异反映了不同地缘政治背景下学者对中国政策效果实现预期的差异。

总体来看,尽管国外学者对共同富裕的实施路径和受益群体有不同理解,但大多认同其应对

① 参见黄泰岩、李楚昊:《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效率和公平关系》,《求是学刊》2024年第5期。

② Bert Hofman, “Common Prosperity Did not Fall from the Sky”, <https://merics.org/en/comment/common-prosperity-did-not-fall-sky>.

③ Dorien Emmers, Hui Wang, Lei Wang, et al.,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Children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6, No. 2, 2024.

④ Sudeep Kumar, “Xi’s Common Prosperity 2035”, https://www.icwa.in/show_content.php?lang=1&level=3&ls_id=6583&lid=4509.

⑤ Nanak Kakwani, Xiaobing Wang, Ning Xue, et al., “Growth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30, No. 1, 2022.

⑥ Alfonso Sanchez-Romera, *The Chinese Lifestyl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p. 173.

⑦ Choi Jinbaek, “The Logic behind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Relations”, *Ifans Focus*, Vol. 2021, No. 30, 2022.

社会不平等的战略价值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多从西方经验出发来分析中国，对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分配制度理解有所局限，这也是我们在理解国外学者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研究时需要辨析的内容。

（四）关于共同富裕与平等主义、福利主义异同辨析的研究

共同富裕是动态发展和相对平衡的统一，体现的是从不平衡至平衡的过程，而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国外学者普遍认同这一特性，并倾向于将中国的共同富裕与西方的福利主义进行对比研究。

在共同富裕与平等主义的区分上，学者们达成了基本共识。他们认为，平等主义虽创造了较高等度的平等，但对社会的富裕程度关注不够^①。英国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提出，中国现在更倾向于公平，但公平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在同一个大锅里吃饭的平均主义^②。葡萄牙卢索福纳大学助理教授保罗·阿方索·B. 杜阿尔特（Paulo Afonso B. Duarte）等学者也指出，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将享受同等水平的富裕^③。马诺杰·凯瓦拉马尼等人将共同富裕提炼为“既不是统一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所有人的富足”^④，展示了共同富裕在兼顾共同性与富裕性两个维度上的理论独特性。

此外，一些国外学者关注共同富裕与福利主义之间的区别。大多数研究者认识到中国的独特国情，明确提出“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复制欧洲式的社会福利模式”^⑤。然而，福利主义也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亚历山大·罗曼诺夫（Alexander V. Lomanov）从增长与福利的辩证关系角度指出，中国不会允许消极依赖的福利文化蔓延，那将永远停止经济增长^⑥。这些研究揭示了共同富裕与福利主义在激励机制、长期目标和实现路径上存在的根本差异。

二、国外学界关于共同富裕动力机制的理论争鸣

在研究共同富裕理论意蕴的基础上，国外学者深入剖析了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动力机制，呈现出多元且复杂的观点。多数学者对其持赞赏态度，认为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体现根本宗旨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及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个别学者则受西方话语霸权影响，持观望态度，甚至对其质疑或抹黑。

① Casey Davidson,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the Next Step in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Guardian (Sydney)*, August 30, 2021.

② Cissy Zhou, “China’s Coming Era of ‘Common Prosperity’ -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Ric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3, 2021.

③ Paulo Afonso B. Duarte, Francisco José B. S. Leandro and Enrique Martínez Galá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Glob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3, p. 39.

④ Andrew Batson, Manoj Kewalramani, Yuen Yuen Ang, et al., “Can Xi Jinping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https://interpret.csis.org/common-prosperity/>.

⑤ Karishma Vaswani, “Changing China: How Xi’s ‘Common Prosperity’ May Impact the World”, *BBC News*, October 7, 2021.

⑥ Alexander V. Lomanov, “To Foresee Black Swans, to Watch Out for Gray Rhino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Vol. 21, No. 2, 2023.

（一）政党角色说：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使命

国外学者从历史脉络、价值追求和实践层面对中国共产党推动共同富裕的使命进行了多维度研究。从历史渊源来看，唐迈指出，“共同富裕”一词最早出现在1953年《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之一^①。从历史连续性角度来看，英国学者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z）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扶贫事业的关注始于1921年，“追求共同富裕和保障中国人民的权利是贯穿中国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②。这些分析表明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连贯性的高度认同。

多位学者将共同富裕视为中国共产党贯彻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体现。有评论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质是追求共同富裕。现在连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强调要缩小贫富差距，中国当然不能落后”^③。推动共同富裕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平等被视为缓和资本主义某些过度现象的重要力量^④。南非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原主任加雅·乔希（Jaya Josie）认为，共同富裕体现了“赋予人民群众最终决定权的理念”^⑤。唐迈进一步阐释其核心是“将经济和社会活动引向生产对社会有用的商品和服务，增加社会福利，使所有人都能发挥潜力，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⑥。

不少国外学者在与西方国家政党的对比中，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对比来看，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议会中，“多数党和容易发生内斗的弱小或强势反对派正在破坏各自社会中消除不平等的倡议和能力”^⑦，美国民主党内所谓的“进步人士”也只是一直在口头上“谈论”财富的不平等，而中国的政府官员却是真正在实干^⑧。卡洛斯·马丁内斯直接指出，“美国及其盟友没有追求共同繁荣，而是正在走向大规模贫困，这种差距凸显出中国在扶贫方面不断取得的成就是其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⑨。

（二）发展转型说：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生需求

国外学者多从中国处于新发展阶段与面临的新问题切入，认为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现实针对性，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唐迈等学者提出，共同富裕标志着中国发展理念从

① Michael Dunford, "The Chines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2, No. 1, 2022.

② Carlos Martinez, "China's Long War on Povert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3, 2023.

③ Cissy Zhou, "China's Coming Era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Ric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3, 2021.

④ Anthea Roberts and Nicolas Lamp, "Navigating Complexity: Globalization Narratives in China and the West",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4, 2022.

⑤ Jaya Josi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Platforms in China-Risk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view*, Vol. 8, No. 4, 2021.

⑥ Michael Dunford, "The Chines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2, No. 1, 2022.

⑦ Augusto Soto, "Understanding the Idea of Common Prosperity", *China Today*, Vol. 70, No. 12, 2021.

⑧ Casey Davidson,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the Next Step in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Guardian (Sydney)*, August 30, 2021.

⑨ Carlos Martinez, "China's Long War on Povert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No. 3, 2023.

“增长优先”向“质量优先”的转变，“在充分考虑公平的前提下优先考虑效率”的观点正在决定性地让位于共享发展的概念^①。

从发展阶段转型的视角看，一些国外学者将共同富裕视为应对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战略调整。“在过去，中国非凡的经济增长史是以环境污染、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城乡和地区差距的扩大等为代价的”^②。罗谷等学者从宏观经济结构角度指出，如果大比例人口仍然贫穷，将严重威胁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因而，“共同富裕可以被视为中国发展的新战略”^③，“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包括探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④。这些观点聚焦于收入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经济层面的问题。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将共同富裕视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综合方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强调，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是解决不平等问题，还要解决所有不协调的负面发展问题：腐败、金融风险、道德堕落、浪费性消费等^⑤。这些分析都将共同富裕置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挑战背景下考察。

综上，国外学者将共同富裕视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它不仅回应了经济结构调整需求，完善了社会治理体系，更反映了中国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构成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核心内涵。

（三）中国方案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既是其鲜明特色，也是区别于西方“两极分化”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国外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认识到，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既体现了中国探索独特现代化道路的决心，也为全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立足于对中国的观察，国外学者意识到，中国不会复刻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马诺杰·凯瓦拉马尼观察到，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一种潜在的信念，认为外来的解决方案或已有的模板不足以解决中国面临的特殊挑战^⑥。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吴国光（Guoguang Wu）认为，这种探索自主发展路径的努力源于对西方模式局限性的认识——北欧经验难以复制到发展中国家，并且自由资本主义或福利资本主义（即强大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也并不能解决当代的不平等问题，而中国的共同富裕理念恰恰是一种可行的方案^⑦。基于此，国

① Michael Dunford, “The Chines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2, No. 1, 2022.

② Michael Dunford, “The Chines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2, No. 1, 2022.

③ Dexter Tiff Roberts, “What Is ‘Common Prosperity’ and How Will It Change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1/12/Common_Pro Prosperity_IB_2021_1.pdf.

④ Weiyu Zhang, Jong-Wook Kwon and Minkyung Choy, “Localiz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The Role of Geographic Proximity to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Center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 421, 2023.

⑤ Andrew Batson, Manoj Kewalramani, Yuen Yuen Ang, et al., “Can Xi Jinping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https://interpret.csis.org/common-prosperity/>.

⑥ Andrew Batson, Manoj Kewalramani, Yuen Yuen Ang, et al., “Can Xi Jinping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https://interpret.csis.org/common-prosperity/>.

⑦ Guoguang Wu,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Program: Caus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https://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3/ASPI_ChinaCommonProsp_report_fin.pdf.

外学者普遍承认中国推动共同富裕必然要探索出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中国的发展和社会问题需要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追求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①，“中国希望证明共同富裕是西方模式的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②。

国外学者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在追求国内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亦致力于推动全球共同繁荣。实现共同富裕呼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为一个国家的理想目标，它与全球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需求相对应^③。彼得·科尼格也认为，中国对共同富裕的愿景远远超出了它的边界，其目的是通过传播共同富裕的理念，以及通过与全球各国合作来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世界。共同富裕是一个崇高而有价值的目标，它有助于在和平和繁荣中连接世界^④。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中国发展中的多边因素将成为促进国际投资和互联经济的催化剂，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政策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⑤。

（四）少量关于共同富裕动力机制的质疑声音及其批评

尽管众多国外学者对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决心与成就表示了赞赏，但也必须看到，少量质疑共同富裕动力机制的论调仍然存在。有观点认为，“共同富裕政策最重要的部分并非集中在经济不平等方面”^⑥，而是关乎对私营企业和外资发展的调控，并可能“严重影响市场创新能力”^⑦。也有分析将共同富裕视为巩固执政基础、在工薪阶层中寻求支持的方式之一^⑧。乔治·索罗斯则宣称：“共同富裕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向中国投资将是一个悲惨的错误。”^⑨当然，这些质疑之声遭到了众多国外学者的反对与驳斥。他们的观点及依据主要在于：其一，批评方法论偏见。委内瑞拉总统办公室国际关系前主任塞尔吉奥·罗德里格斯·盖尔芬斯坦（Sergio Rodriguez Gelfenstein）指出，这些看法反映了西方分析家在理解中国经济模式上的困境，即以西方市场规律为基准来衡量政策有效性，然而，这些市场规律并非普世真理，不应被盲目奉为金科玉律^⑩。其二，剖析意识形态根源。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提

① Andrew Batson, Manoj Kewalramani, Yuen Yuen Ang, et al., “Can Xi Jinping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https://interpret.csis.org/common-prosperity/>.

② Karishma Vaswani, “Changing China: How Xi’s ‘Common Prosperity’ May Impact the World”, *BBC News*, October 7, 2021.

③ Michael Dunford, “The Chines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2, No. 1, 2022.

④ Peter Koenig, “China’s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ts Vis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Global Research*, November 11, 2021.

⑤ Jaya Josi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Platforms in China-Risk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view*, Vol. 8, No. 4, 2021.

⑥ “China’s Economic Rebalancing and ‘Common Prosperity’”, *Strategic Comments*, Vol. 28, No. 10, 2022.

⑦ Huw Roberts, Josh Cows, Emmie Hine, et al., “Gove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mparing Aims and Promoting Ethical Outcome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39, No. 2, 2023.

⑧ Andrew Collier, *China’s Technology War: Why Beijing Took Down Its Tech Giant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 23.

⑨ George Soros, “Black Rock’s China Blund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6, 2021.

⑩ Sergio Rodriguez Gelfenstein, “China: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https://libya360.wordpress.com/2021/09/10/china-towards-common-prosperity/>.

出,乔治·索罗斯所言不过是感觉共同富裕的原则“对美国新自由主义优先事项构成了生存威胁”,因为中国的共同富裕没有让经济盈余集中在企业和外国投资者手中,“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异端邪说”^①。其三,揭示对历史与实践价值的忽视。加雅·乔希强调,“保护消费者福利和工人权利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DNA”^②。事实上,共同富裕政策旨在促进整体经济繁荣,而非控制私营经济发展,“2021年的重要性可能要多年后才会得到充分认可”^③,从长远来看,共同富裕政策一定会使经济受益。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的质疑,有的是因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有的则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新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更有甚者是完全基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等原因对中国的刻意污蔑。正如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系前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所说,一些西方学者将西方思维方式投射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他们并不真的需要了解中国,他们只是希望中国“像我们一样做”,因此他们条件反射式地认为共同富裕的主张是消极的、负面的^④。面对少部分国外学者的误解与诘难,我们既要批判性分析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预设和方法论局限,更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自信,对误解与质疑作出有效回应,对污蔑与抹黑进行有力驳斥。

三、国外学界对推动共同富裕实践理路的学理论析

国外学者倾向于从“三次分配”的角度理解共同富裕的实践理路,即从依靠市场进行的第一次分配、依靠政府进行的第二次分配以及依靠社会通过慈善公益等方式进行的第三次分配来讨论推进共同富裕的举措。

(一) 市场作用:国外学者对市场机制在共同富裕中角色的评估

在共同富裕的实践理路中,国外学者普遍认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强调需加强市场监管和规制,以确保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首先,市场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Chi Hung Kwan)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在公平和透明的规则下协调所有阶层的利益,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市场的活力”^⑤。这强调了市场活力与公平规则的辩证统一。

① Michael Hudson, “The Vocabulary of Neoliberal Diplomacy in Today’s New Cold War”, *CounterPunch*, September 13, 2021.

② Jaya Josi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Platforms in China-Risk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view*, Vol. 8, No. 4, 2021.

③ Kerry Liu, “China’s Reform Spree in 2021: Common Prosperity and Others”, *Economic Papers*, Vol. 41, No. 3, 2022.

④ Martin Jacques, “To Understand China’s Success, First Understand Civilization”, in Lujun Chen and Karl-Heinz Pohl (eds.), *East-West Dialogue*,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2023, pp. 12–13.

⑤ Chi Hung Kwan, “China Aims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creasing Rural Incomes and Secondary Distribution Reform as the Key”, <https://www.rieti.go.jp/en/china/22010501.html>.

其次，建设各类主体公平竞争和平等对待的市场环境被视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在国外学者看来，共同富裕还包括市场中公平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如获得教育、养老和医疗等方面的平等，这意味着市场中服务提供者的价格需要实现公平^①。不仅如此，中国还需要继续推动与市场相关的制度和政策改革，解决影响个人福利的各种不平等因素，促进机会平等和公平，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②。

再次，完善要素市场化改革被视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郝福满等学者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即：投资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改革户籍制度，让所有工人都能去他们最有生产力的地方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民的土地权利，这些都有助于更公平地分好蛋糕^③。南非大学姆贝基非洲领导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谭哲理（Paul Tembe）尤其重视劳动力要素，称赞共同富裕道路为提高民众教育和自我发展能力创造了条件，认为这有助于增加人力资本、提升社会专业技能、增强人们就业和创业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④。同时，那纳·克卡瓦尼等人也指出，中国还要在改善劳动力市场方面付出更多努力。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还能增加他们的教育回报，反过来又会鼓励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⑤。

最后，国外学者也强调对市场和资本进行监管的重要性。唐迈强调，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解决资产所有权问题和限制资产过度市场化至关重要^⑥。约翰·罗斯也强调，缺乏对资本与市场的监管将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对财富的公然炫耀、过度的名人文化以及金钱作为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⑦等问题，从而偏离共同富裕。

（二）政府角色：国外学者对政府在共同富裕中作用的分析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政府发挥经济调节、公共服务等职能，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和防范贫富两极分化。国外学者肯定政府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并对政府应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进行了研讨。

首先，国外学者强调政府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关键作用。唐迈等学者驳斥了中国增长由私营部门推动的观点，并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仅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

① Cissy Zhou, “China’s Coming Era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Ric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3, 2021.

② Nanak Kakwani, Xiaobing Wang, Ning Xue, et al., “Growth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30, No. 1, 2022.

③ Frank N. Pieke and Bert Hofman, *CPC Futures: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22, p. 118.

④ Paul Tembe, “Common Prosperity”, <https://www.iol.co.za/news/politics/opinion/common-prosperity-705e8d0b-5c9c-4a29-a536-842a9130d1cf>.

⑤ Nanak Kakwani, Xiaobing Wang, Ning Xue, et al., “Growth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30, No. 1, 2022.

⑥ Michael Dunford, “The Chines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2, No. 1, 2022.

⑦ John Ross, “Why Common Prosperity Is Good for Socialism and for China’s Econom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3, No. 1, 2022.

基础，也是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制度保证。因而，政府要坚持和完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实现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鼓励创新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中的关键作用^①。

其次，实现共同富裕要求政府积极推进民生福祉均衡共享，夯实兜底安全网。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通过政府力量来健全社会发展成果的均衡共享机制，有助于共同富裕公共基础的夯实和公共分配效能的激发。关志雄指出，在财政支出方面，政府需要优化财政收入的使用方向和结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缩小“雇员”和“居民”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在医疗保险等方面的福利差距^②。那纳·克卡瓦尼等人认为，政府要重视整个“安全网计划”在提高总体福利方面的重要性，尤其要在养老金制度、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③。这些观点反映出国外学者对政府调控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其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在具体举措方面，多位国外学者积极评价了中国政府对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的监管措施。在罗谷看来，高昂的住房、医疗和教育费用都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原因，中国政府采取了禁止营利性家教业务、监管房价等举措以减轻家庭负担^④。并且，对中小學生补习中心进行监管、限制未成年人玩电子游戏时间等，都有助于减轻高昂私人课程费用的经济压力，为低收入和农村家庭的儿童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⑤。这表明国外学者正从社会公平视角考察政府的监管政策，而非简单从市场干预角度评判。

最后，国外学者对共同富裕中的税收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强调政府应持续改进和优化税制结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认为，税收是政府重要的财政工具，从国际经验来看，改善收入分配、支持共同富裕的最有效途径是利用税收制度的再分配效应，特别是累进所得税^⑥。关志雄基于公共财政的视角，建议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例、通过房地产税改革和其他措施加强资产税收，同时促进规范的征税行为，使公共财政能够发挥充分的收入再分配功能^⑦。一些学者关注到具体税种的作用，如英国路透社高级记者姚凯文（Kevin Yao）认为，实施财产税和遗产税以解决贫富差距，可能会获得新的动力^⑧。郝福满也强调，对房地产征税有

① Michael Dunford, “The Chines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2, No. 1, 2022.

② Chi Hung Kwan, “China Aims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creasing Rural Incomes and Secondary Distribution Reform as the Key”, <https://www.rieti.go.jp/en/china/22010501.html>.

③ Nanak Kakwani, Xiaobing Wang, Ning Xue, et al., “Growth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30, No. 1, 2022.

④ Dexter Tiff Roberts, “What Is ‘Common Prosperity’ and How Will It Change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1/12/Common_Prosperty_IB_2021_1.pdf.

⑤ Michael Dunford, “The Chines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12, No. 1, 2022.

⑥ Andrew Batson, Manoj Kewalamani, Yuen Yuen Ang, et al., “Can Xi Jinping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https://interpret.csis.org/common-prosperity/>.

⑦ Chi Hung Kwan, “China Aims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creasing Rural Incomes and Secondary Distribution Reform as the Key”, <https://www.rieti.go.jp/en/china/22010501.html>.

⑧ Kevin Yao, “Explainer: What is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Drive and Why Does It Matter?”, *Reuters*, September 2, 2021.

助于提高中国整体税收的公平性^①。需要注意的是,国外学者的研讨也体现了西方经济学对税收作为再分配工具重要性的共识,我们仍需对其具体观点和基本立场加以辨别,批判性地吸收并为我所用,为更好发挥税收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提供理论参鉴。

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也强调注重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约翰·罗斯分析指出,中国的共同富裕既不能依靠百分之百的国家控制来实现,也不能走“极右”道路,即接受资本的“疯狂”发展。他称赞当下中国的共同富裕政策既有助于社会稳定,又有益于经济发展,既具有惊人的创新性,同时又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并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一致^②。

总而言之,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政府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尽管其观点不可避免地存在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上的局限,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为进一步发挥政府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

(三) 社会参与: 国外学者对社会力量在共同富裕中作用的关注

市场与政府对于共同富裕而言不可或缺,但当前单凭市场与政府的“两轮驱动”还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机制,打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爱社会协同推进共同富裕的“三轮驱动”格局。国外学者也强调做好社会主导的第三次分配,尤其强调慈善捐赠和志愿活动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国外学者关注社会责任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认为推动共同富裕从追求绝对利润最大化转向关注社会责任,这一转向旨在为人类、地球和社会创造长期价值。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提出,中国现有的社会援助工具有助于减轻与预期的持续经济转型相关的最弱势群体的风险^③。

国外学者对第三次分配的具体落实举措也展开了探讨。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徐元敬(Jennifer Y. J. Hsu)等提出,第三次分配概念的核心是相对富裕的个人和私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来分配财富,其中包括创造就业机会。中国政府正努力在公民中发展和培养慈善和志愿服务文化,使其成为一种道德期望^④。苏迪普·库马尔归纳了关于第三次分配的两种意见:一类是通过合理的自愿捐款、商业精英的慈善和福利事业,以及更好的中央和国家协调来战略性地管理现有的资源和财富;另一类则强调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财富三次分配的基本前提^⑤。

然而,尽管第三次分配被认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但也有个别学者对此表示质疑。

① Bert Hofamn, “Commen Prosperity”, in Frank N. Pieke and Bert Hofman (eds), *CPC Futures: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22, p. 118.

② John Ross, “Why Common Prosperity Is Good for Socialism and for China’s Econom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3, No. 1, 2022.

③ World Bank Group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r Decade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Drivers, Insights for the World, and the Way Ahea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2022, p. x.

④ Jennifer Y. J. Hsu, Carolyn Hsu, Reza Hasmath, et al., “Creating a Culture of Philanthropy and Volunteer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Boston, USA)*, March, 2023.

⑤ Sudeep Kumar, “Xi’s Common Prosperity 2035”, https://www.icwa.in/show_content.php?lang=1&level=3&ls_id=6583&lid=4509.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 (Michael Pettis) 等学者宣称, 共同富裕或许有可能通过迫使私营部门承担重新平衡中国收入分配的调整成本, 从而破坏中国经济的活力^①。不过, 徐元敬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 在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背景下, 中国公民在主动参与志愿活动和慈善捐赠方面有所增加。其中, 党员比非党员更积极参与志愿活动, 党员的捐款和志愿服务越来越多, 也越发相信他们的行为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这些结果显示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相关政策和措施能够推动公民参与慈善和志愿服务^②。

(四) 推进模式: 国外学者对共同富裕推进路径的观察

国外学者对中国共同富裕试点先行与总体推进的路径展开了探讨。正如德国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曾莱恩 (Max J. Zenglein) 所言,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没有快速解决方案,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深化制度改革^③。谭哲理也解释道, “中国必须全面了解这一目标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繁重性, 规划不同阶段的目标, 分阶段推进”^④, 而试点先行与总体推进的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 国外学者也对共同富裕的试点实践及其影响进行了探讨, 尤其关注了浙江省作为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意义。

大部分国外学者对浙江省推进共同富裕的试点作用和试点先行的路径持肯定态度, 西班牙的中国问题专家苏傲古 (Augusto Soto) 指出, 共同富裕政策的实施是全面的, 符合中国过去的政策, 符合“五年规划”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做法, 并遵循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 即先进行试验性试点探索, 以了解改革的影响, 如果成功, 则在更广泛范围内推广^⑤。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迪克森 (Bruce Dickson) 等人也认为, 浙江省作为中国最繁荣的省份之一, 现在正在进行共同富裕政策的试验和实践。这种在地方试点项目中测试新计划和改革的做法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方法^⑥。姚凯文也提到, 浙江省的试点计划旨在到 2025 年缩小该省的收入差距^⑦。同时, “中国也在敦促其他地区探索适合其自身情况的有效途径”^⑧。然而, 个别学者对浙江省在共同富裕政策实施方面的未来效果表示怀疑。巴里·诺顿认为, 由于中国各省在税收制度方面没有足够的改

① Michael Pettis, “Will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Upgrade Dual Circulation?”,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china-financial-markets/2021/10/will-chinas-common-prosperity-upgrade-dual-circulation?lang=en>.

② Jennifer Y. J. Hsu, Carolyn Hsu, Reza Hasmath, et al., “Creating a Culture of Philanthropy and Volunteer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Boston, USA)*, March, 2023.

③ Max J. Zenglein, “Xi’s Call for Common Prosperity Signals a New Period of Populism, State Regulation and Interventionism”, <https://merics.org/en/comment/xis-call-common-prosperity-signals-new-period-populism-state-regulation-and-interventionism>.

④ Paul Tembe, “Common Prosperity”, <https://www.iol.co.za/news/politics/opinion/common-prosperity-705e8d0b-5c9c-4a29-a536-842a9130d1cf>.

⑤ Augusto Soto, “Understanding the Idea of Common Prosperity”, *China Today*, Vol. 70, No. 12, 2021.

⑥ Bruce Dickson, Kerry Brown, Kailing Xie, et al., “Common Prosperity: What Next for China?”, <https://chathamhouse.soutron.net/Portal/Public/en-GB/DownloadImageFile.ashx?objectId=5520&ownerType=0&ownerId=191642>.

⑦ Kevin Yao, “Explainer: What Is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Drive and Why Does It Matter?”, *Reuters*, September 2, 2021.

⑧ Paul Tembe, “Common Prosperity”, <https://www.iol.co.za/news/politics/opinion/common-prosperity-705e8d0b-5c9c-4a29-a536-842a9130d1cf>.

革，因此依赖于地区试点实践可能无法充分发挥改善收入分配的潜力^①。综上，肯定者从中国政策演变的历史延续性角度评估试点价值，而批评者则基于西方制度分析框架质疑其效力。这种评价差异也体现了国外学者在理解中国政策及其推广机制上的认知局限和理论分歧。

结 语

本文系统梳理、辨识和分析了国外学界对共同富裕的研究。2021 年以来，国外学界对共同富裕议题的关注显著增加，大量学术专著、期刊文章、研讨会、新闻报道以及网站评论对此进行了探讨，并从初期的观望甚至怀疑，逐步深化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认识到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重要地位及其深远影响。然而，由于文化差异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少部分国外学者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仍存在明显的偏差和误解。部分研究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或西方中心视角，倾向于将共同富裕窄化为短期政策实践，而对其深层理论基础与概念内涵的探讨则有所不足。但整体而言，国外学界对共同富裕的研究正逐步趋向客观与理性，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政策效能评估，从表层政策描述迈向深层机制探究，从单一西方参照系扩展至多元全球视野，展现出方法多元与认知递进的鲜明特征。这一方面在于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决心与实践探索，为国际观察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聚焦点，另一方面也与部分国外学者对既有发展模式和理论的反思有关。这为推动共同富裕理念的国际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国内共同富裕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向。首先，应深化共同富裕的理论探索，特别是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在此过程中，还要加强国际学理对话，清晰阐释共同富裕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事关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抉择。其次，应加强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经验，更好地阐释共同富裕的独特性和优势。再次，应完善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研究，深入分析“三次分配”机制在中国语境下的具体实施策略和效果。最后，我国也应该正视国外质疑和误解的声音，加强对相关观点的针对性回应，对于歪曲和诋毁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声音予以坚决驳斥。总之，我国既要主动加强对话与交流，促进中外学者在共同富裕议题上的深入交流和互鉴；也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快构建成熟完善的共同富裕国际话语体系，对外讲好共同富裕的中国故事，为人类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尹俊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余涛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孙应帅〕

^① Andrew Batson, Manoj Kewalramani, Yuen Yuen Ang, et al., "Can Xi Jinping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https://interpret.csis.org/common-prosperity/>.